中美兩國眞的會走向全面對峙嗎?

編者按:近期中美在南海、朝鮮半島上展開了激烈的政治博弈，中美兩國之間的深層矛盾越來越走向公開化。有評論認爲中美正在走上全面對峙的道路，修昔底德陷阱不可避免，中美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正在日趨尖銳。而《金融時報》專欄作家吉迪恩·拉赫曼則發表評論認爲,中美之間並不可能走向全面對峙，中美之間的矛盾或最終世界經濟重心的東移得到化解。現轉發吉迪恩·拉赫曼評論文章的部分內容,供讀者參考。

中美全面對峙的可能性並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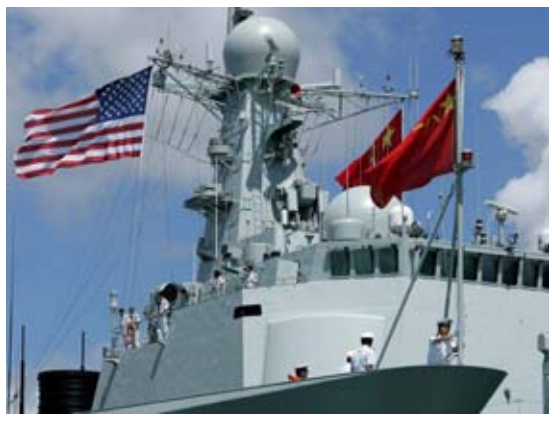
1993 年,當我作爲一名外國記者第一次來到亞洲時，以下這一觀點所描述的前景似乎仍然遙不可及：亞洲崛起有朝一日可能威脅到西方對地緣政治的主導。那時,中國正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但顯然仍是一個貧窮國家。即便在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城市上海，大街上的輕便摩托車仍多過汽車。浦東那些如今象徵着這個城市財富的耀眼的摩天大樓，當時還只是建築師們的藍圖。即便在那時,中美之間也存在着軍事緊張局勢。但當北京方面 1996 年試圖通過在台灣周邊海域試射導彈來威懾這個“反叛之省”時，美國迅速向該地區派出航空母艦——結果北京退讓了。那時,美國毫無疑問仍是世界唯一超級大國。

二十年過去瞭,如今中國正以越來越大的決心挑戰太平洋地區的力量平衡。但要眞正理解我們正在經歷的這個時代的意義，需要回到歐洲開始帝國主義擴張之前的那個時代。15 世紀伊始,中國和伊斯蘭世界經濟、政治的實力與先進程度,至少與歐洲水平相當。伴隨 15 世紀 90 年代歐洲偉大的航海探險活動，全球力量平衡開始傾斜。1492 年,受雇于西班牙王室的熱那亞探險家克里斯托弗·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橫穿了大西洋。1498 年,葡萄牙探險家瓦斯科·達伽馬(Vasco da Gama)到達了印度。

隨後幾個世紀,歐洲在軍事、航海及工業技術方面的優勢使得部分歐洲國家建立起全球帝國。到 20 世紀初,僅大英帝國就覆蓋了全世界近四分之一的陸地面積。

兩次世界大戰以及隨後的反殖民化浪潮導致了歐洲帝國主義在 20 世紀下半葉的崩潰。但二戰後崛起爲世界頭號強國的美國延續了西方的霸權。冷戰期間,政治上不屬於“西方”的蘇聯是另一個大國，但即便蘇聯也是一個歐洲大國。

然而,過去 50 年間,西方的全球經濟主導地位已經被一步步侵蝕。亞洲經濟巨變首先顯現在上世紀 60 年代的日本，然後是 70 年代的韓國、台灣及東南亞部分地區。從 1980 年開始,中國經濟開始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 (這一增速由日本在 60 年代開創)。經過上世紀 90 年代初的經濟改革之後,印度也增長強勁,儘管不像中國那么快。



具有象徵意義的時刻出現在 2014 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宣佈，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已成爲世界最大經濟體。自 19 世紀 70 年代初以來，美國一直是世界最大經濟體;如今,中國變成了“第一”。中國崛起只是更大範圍內經濟實力重心轉移的一部分。IMF 的數據顯示，如今世界前四大經濟體中有三個位于亞洲。中國位居第一,美國第二,印度和日本分列第三、第四。

經濟實力重心向亞洲轉移的根本原因很簡單:人口的比重。到 2025 年,世界大約三分之二的人口將生活在亞洲。相比之下,美國將佔世界人口的約 5%,歐盟約佔 7%。

瑞典卡羅琳斯卡學院 (Karolinska Institute) 的漢斯·羅斯林(Hans Rosling)巧妙地總結了這一點,她說世界的密碼是“1114”,意思是:地球上 70 億人口有約 1 個十億生活在歐洲,1 個十億生活在美洲,1 個十億生活在非洲，還有 4 個十億生活在亞洲。到 2050 年,世界人口可能達到 90 億,這一密碼將變爲“1125”——非洲和亞洲各增加 1 個十億。

幾個世紀以來,東西方之間的財富差距、技術鴻溝如此巨大，使得西方國家能夠主導國際事務和全球經濟——不受人口多寡影響。但亞洲在過去兩代人的時間里快速的經濟發展意味着,這種財富差距已顯著縮小,以至於亞洲的人口比重開始改變世界的力量平衡。

西方對亞洲崛起影響的擔憂呈現出不同的形式。左翼——以及當下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代表的民族主義右翼——極爲關注的是亞洲崛起對西方工人生活水平的影響。然而,大部分美國建制派往往存在的一種傾向是，認爲亞洲崛起是幻覺或曇花一現，不會眞正威脅到美國的頭號大國地位，因而不足爲懼。任何暴露出亞洲 (尤其是中國) 在經濟和政治方面短處的迹象都會被揪住不放，而無論在政治還是經濟上，中國的示警信號可一點兒也不少。

但從地緣政治角度看，中國或亞洲增長放緩將不再影響大勢。讓中印兩國能夠爭取大國地位的經濟發展已經實現。西方各國政府里最資深的分析人士已經認定，經濟實力的重心將繼續從西方向東方轉移，而且這種經濟上的變化將轉化爲戰略力量。美國情報體系(United State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彙集了包括中央情報局(CIA)在內的所有美國情報機構。2012 年,該體系內負責戰略思維的核心機構——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曾預測，“按國內生產總值(GDP)、人口規模、軍事開支以及科技投資計算,到 2030 年,亞洲的全球實力將超過北美與歐洲之和”。

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還毫不避諱地詳細描繪了該趨勢對美國力量的影響。它寫道:“美國治下的和平 (Pax Americana)——自 1945 年開始美國支配國際政治的時代——正在快速走向終結。”從隨後四年的局勢變化來看,這份在奧巴馬即將開始第二個任期前發佈的報告似乎很有預見性。美國坐視叙利亞的戰事不斷陞級,俄羅斯(冷戰後喪失大國地位)再度成爲歐洲安全的威脅。

但從長遠來看，美國治下和平在太平洋地區受到的威脅或許才是最事關重大的。美國人知道,亞洲如今是全球經濟的核心。因此,奧巴馬政府的一項標誌性外交政策就是“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將軍事、外交資源轉移至亞洲,以應對全球經濟重心東移以及中國崛起的挑戰。在如何以及何時運用美國的力量方面,奧巴馬政府也一直試圖採取一種更謹慎、更策略性的方式。美國有意不再深度介入中東事務，部分原因是其正試圖保存實力和資源以對抗崛起的中國。然而,力量也跟形象有關。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人們看到美國不再像以前那樣堅決在歐洲及中東扮演世界警察角色，反過來也對美國在亞洲本身的力量能持續多久產生質疑。

歐洲盟友的長期問題也一直在削弱奧巴馬政府維持美國治下和平的能力。雖然有很多指責都認爲奧巴馬政府“軟弱”,但事實是,美國無疑仍是西方聯盟最強大的一部分。由於歐洲經濟陷入危機、軍費開支下降,美國如今承擔了北約(Nato)近 75%的軍事開支。

雖説特朗普前後矛盾、言辭粗魯,但他卻準確指出了東方化時代美國力量遭遇的一些新出現的困境。他質疑美國在財政上能否繼續擔負得起這一重擔，即保護歐洲及亞洲盟友免受俄羅斯或中國的潛在攻勢侵害。他還極力攻擊爲亞洲崛起提供了國際經濟框架的 “全球化”及“糟糕的”貿易協議。

因此,對中國而言,特朗普主義可能既帶來危機,也帶來機遇。在地緣政治層面,特朗普有過念頭要撤回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力量——這將拱手讓出北京方面渴望在其周邊地區得到的勢力範圍。但在經濟方面,特朗普明目張膽的貿易保護主義可能會嚴重限制美國這個世界最大市場的開放，從而對所有正在崛起的亞洲經濟體構成威脅。

對希拉里陣營及多數美國建制派而言,特朗普的政治方案在地緣政治和經濟上是離經叛道的。不久前在費城召開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我聽到美國外交政策建制派的中堅力量——如馬德琳·奧爾布賴特 (Madeleine Albright)、湯姆·多尼倫(Tom Donilon)——明確表示,維護全球市場開放和美國的聯盟體系(像自 1945 年以來一樣) 仍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兩大支柱。

如果希拉里在 11 月大選中獲勝,這意味着美國將堅持這一久經考驗的路線。但經濟和政治力量重心東移意味着,無論誰入主白宮,西方佔據絶對主導地位的日子都行將結束。

海外風險頻發 中國眞的準備好了嗎?

編者按:前不久,中國維和人員在南蘇丹遇襲,事件再次引發世人對中國海外安全保護的思考。事實上,除了維和人員的安全外,正在日益走向世界舞臺中心的中國，將不可避免面臨日趨複雜的海外風險,這也是索馬里護航、也門撤僑等事件發生的緣由。對此,中國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儲殷對中國的海外風險、保護現狀、短板、策略進行了深入分析,可供讀者探討,因爲這將是中國要面對的愈來愈現實的議題。以下內容原載于《多維 CN》第 12 期。

維和人員南蘇丹遇襲事件引發世人對中國海外風險的關注(圖源:新華社)

隨着中國在全球影響力的不斷增強,中國的利益邊疆已經遠遠超出了物理意義上的國家邊界,然而,相比于快速膨脹的海外利益,中國應對海外風險的能力卻存在比較明顯的短板。是否能夠補足短板,以何種方式補強短板,這將對未來中國的全球化道路産生極其重大的影響。

中國海外風險已經進入高發期

中國已經成爲一個全球性國家。這個全球性有三個方面的趨勢,第一,中國的崛起過程是一個不斷融入全球體系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國家利益一定要走出國門、超越周邊,向全球所有區域擴散，呈現出國家利益全球化的趨勢。中國的國家發展也前所未有地與全球市場、全球安全秩序的穩定密切相關。

第二,中國的全球化過程就是一個面向西方與第三世界的全球化發展的過程。在這樣一個過程中,一些安全形勢嚴峻、政局不穩甚至頻發戰亂的地區也開始成爲中國國家利益進入的地區。尤其是在 " 一帶一路 " 的推進過程中,大量中國企業和人員正在走進非洲、中東一些地區,其中包括阿富汗、伊拉克、南蘇丹等安全局勢相當嚴峻的國家與地區，這意味着中國海外利益的風險也將隨之大大增加。

第三,中國的全球化過程,也是一個從 " 搭便車 " 到 " 負責任 " 的過程。在這個過程當中,爲地區乃至全球提供公共産品的 " 積極有爲 " 將逐步取代 " 韜光養晦 " 的傳統策略。尤其是在美國國力相對下降,收縮意圖明顯,全球安全形勢惡化的形勢下，中國終將不可避免地直面全球體系所引起的安全風險，並從一個搭便車者向一個負責任的領導者轉化。

伴隨着中國全球化的三個趨勢,中國的海外利益在近二十年里,將面臨更多的風險。這主要是有三個方面的原因。其一,中國的海外利益膨脹過快，遠遠超出了現有海外利益保護的框架。中國在 2015 年出國人員達到 1.2 億,出國投資企業接近 3 萬家。這種量的增長,已經讓以 " 領事保護 "、" 國家保護 " 爲主要方式的海外利益保護機制不堪重負。

其二，在中國海外利益大舉輸出的同時,全球安全局勢正在變得日益惡化。中東地區的伊斯蘭國坐大，相當多數的第三世界國家在近 10 年中出現了比較明顯的政治衰朽，傳統政治秩序呈現出破潰的態勢，造成了某些國家國內政局動蕩甚至發生社會騷亂乃至內戰。最爲重要的是，冷戰後以美國的霸權爲基礎的全球安全框架,正在面臨世界權力格局多極化、非傳統安全威脅興起與地區大國崛起等多重挑戰，曾經存在的安全平衡與地區秩序正在面臨解體與重構,在這種態勢之下,未來的二三十年里,世界的安全問題只會變得更加嚴重。

其三,中國周邊地區的安全局勢正在面臨更加嚴峻的威脅。在中國的海外利益佈局中,西北方向與東南方向一直是兩個重點。中國 - 中亞 - 西亞方向與中國 - 巴基斯坦 - 伊朗方向,關係到中國的能源安全問題,而中國 - 中南半島方向則與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國家影響力尤其是南海權益密切相關。在近兩年中,這兩個地區的安全局勢都面臨比較嚴重的問題。阿富汗、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薩克斯坦等國自 2014 年以來頻頻發生恐怖襲擊事件。尤其是在中國的傳統關係戶巴基斯坦，也開始出現了針對中國人的襲擊行爲。另一方面,印尼、馬來西亞等國的極端宗教勢力也呈現出令人擔憂的發展態勢，越南的排華騷亂與緬甸、泰國少數族群的問題也讓中國在該地區的投資與人員面臨越來越大的安全風險。

中國海外利益保護的現狀與短板

在日益增長的安全風險面前，中國的有關部門也針對性地做出了一些調整。一方面,中國的國家軍事力量也在近幾年間，多次實施了對中國海外人員的保護與疏散,比如索馬里護航、利比亞撤僑、也門撤僑等。

另一方面，中國的外交部門在近十年間明顯加強了領事保護機制的建設，不僅增加了領事處以及相應部門的人員與編制，而且還積極採用了電子政務等最新的管理與服務方法。除此之外,中國的僑聯、商會等多個涉外部門也都積極地盤整各自的資源,爲保障中國海外企業、人員的利益而服務。然而問題在于,以上的這些努力仍然難以滿足中國海外利益保護的現實巨大需求,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其一是安保資源主要依靠國家，而民間主體無論是在安保投入還是安保意識上都存在嚴重短板。中國的海外利益保護,到目前爲止還是主要依靠國家而非市場。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大批走出去的企業是國有大中型企業,其安保本就是體制內部門的責任。另一方面也是因爲，中國的民營企業與個體出國人員,對於國家過于依賴，並且通常捨不得通過市場購買安保服務。然而坦率地説,這種不靠市場靠國家的模式已經越來越難以有效保障海外企業與人員的安全。一方面,出去的魚太多,很多還太小，安全網已經罩不過來。另一方面，我們的領事保護主要還是通過與當地政府的合作來進行,在一些中央政府力量薄弱，甚至形同虛設的國家,這種領事保護的效果往往也不容樂觀。

其二，中國安保服務的國際化水平仍然在一個較低的水準，難以承擔複雜的海外安保任務。考慮到西方安保公司的昂貴價格,大量的中國企業往往傾向于購買更加便宜的安保服務。然而在一些高風險地區，當地的安保服務通常也是高風險的。在南非以及中東一些國家,當地保安、司機通常和綁匪、黑幫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里應外合、監守自盜的事情屢見不鮮。在拉丁美洲的委內瑞拉,當地的部分警察、安全部隊甚至都干起白天巡邏摸門子，晚上蒙面破門子的勾當。在西方人雇不起、當地人信不過的情況下,中國國內的安保行業走出去,就成爲中國海外利益保護的急所。

然而從目前中國安保行業的發展來看,要承擔中國安保走出去的任務，恐怕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一般來説,海外安保除了物理性的防禦之外,還有情報收集、戰略設計、人脈經營與現場反應等多重功能。離開了情報收集、人脈經營等高端內容，高層次的安保就成了低層次的保安。很多中國安保公司,僅僅滿足于有一身武藝、佩戴槍械的初級階段,遠遠不能適應境外複雜且危險的安保任務。也正因爲此,從目前的實踐來看，中國的安保公司只在海上隨船護航上做的相對比較到位。

其三,中國海外華人華僑缺乏組織、各自爲政、一盤散沙的現象比較突出，難以爲海外華商、華人提供有效的幫助與保障。在海外風險的救助中,同胞、同族的互助往往是極爲重要的資源。事實上,在中國長期積貧積弱的時代,這種華人間的互助，曾經是大批海外華人最重要的安全保障。然而,隨着 90 年代末,大批新華人走出國門之後,華人社區的離散與內斗卻愈加嚴重。一方面,華人內部山頭林立,新老華人之間、不同地區之間、不同層次之間離散甚至內訌的現象十分普遍。另一方面,在近十年,海外華人社區內部侵害華人的情況逐漸呈現出令人不安的增長趨勢。華人犯罪分子與本地犯罪團夥里應外合,侵害華人華商成爲了相當常見的現象。爲此,中國公安部門在拉丁美洲、非洲等地區,多次進行過相應的打擊行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

中國海外利益保護的現實策略

雖然中國民間不乏要求解放軍走出國門保護中國海外利益的主張,但目前條件並不成熟。一方面,中國反對霸權主義、帝國主義,主張不干涉內政的國家原則已經構成了對自己的嚴重束縛。即使是所謂創造性介入的説法也面臨嚴重的政治不正確的指控。另一方面,中國解放軍不僅在走出國門方面一直秉持着高度的謹慎,而且也缺乏走出國門相應的準備。海外投送軍力的問題絶不僅僅是一個軍事問題，它還涉及外交、情報等多個領域。美國在全球的干預與其自冷戰時代在全球的經營密不可分，法國在非洲的干預也得益於其對於法語非洲地區強大的宗主國影響。相比較而言,中國對於世界的大多數地區還缺乏人脈支持與情報收集，就軍事與情報而言,中國還不是一個全球性的大國。

在這種海外利益擴張速度遠遠超過海外軍事力量增長的情況下，中國的海外利益保護在很長時間內將主要依賴國家、市場與海外華人社群三個基點的有效聯動來進行。一方面,對於大規模戰亂、自然災害等緊急狀況,國家外交乃至軍事力量的介入,將成爲最主要的救助方式。另一方面,除了國家重點工程之外,包括國有企業在內的大多數走出去的企業與人員，都將被鼓勵儘可能地依靠市場來購買安保服務。中國的安保行業的國際化將在未來 5 至 10 年內成爲世界安保産業發展最重要的內容。除了這兩方面之外，海外華人社區的整合與自治也將成爲未來中國海外利益保護最重要的內容。在目前的實踐中,南非、肯尼亞的一些華人社區通過自發組織起的互助機制，已經在安保方面取得了相當不錯的效果。